

◎ 大象漫步书系 · 周立民

另一个巴金

大象出版社

◎ 大象漫步书系 周立民

另一个巴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个巴金/周立民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3

(大象漫步书系/李辉主编)

ISBN 7-5347-2707-3

I. 另… II. 周… III. 巴金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075489号

责任编辑 孟建华

责任校对 牛志远 郑晓慧

书籍设计 张 胜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 - 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40

印 张 $5\frac{9}{10}$

字 数 105千字

印 数 1 - 3 000册

定 价 8.40元

总序

李辉

大象漫步于原野，有一种含义丰富的姿态：稳重而步履踏实，从容而神态悠闲。以“大象漫步”为这套书系命名，一方面与积极支持该套丛书出版的大象出版社名称吻合，另一方面更想努力体现出该书系在选择作者、涉猎题材诸方面的特色。各位作者，或极目天下，或细观内心；不同领域，不同文风，但体现出的历史眼光、人生态度和现实精神大致相同。

“大象漫步”书系每辑册数不等，所收作品每册主题将相对集中，每册字数在八万字左右。内容、体裁、风格相对自由，追求多样化，可包括随笔、书话、书信、自传、回忆录、译文等，根据作者的不同特点

和每部作品的专题而定。

在陆续推出老文人新作的同时,本书系将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青年作者的力作。新的作者,新的面目,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和触角,以他们不同于前辈人的知识结构,常常会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目 录

朝鲜的梦

——巴金在1952	001
一、我真的不愿意离开『家』	002
二、把应该去的去掉	007
三、我得咬紧牙齿	013
四、阿里朗，阿里朗	016
五、责无旁贷地歌功颂德	019
六、『废品』《三同志》	026
七、宁要『正确』，不要『真实』	037
八、脱胎换骨了吗？	042
热情的赞歌与沉痛的悲歌	
——巴金在1958	048
一、一天，二十年的速度	048
二、文艺也有试验田	050

三、与『旧我』告别·····	〇五二
四、思想不断地在变化·····	〇五五
五、『创作自由』不是天赐·····	〇六〇
六、没有写出一篇满意的作品·····	〇六四
七、只求平安无事·····	〇六六
八、『拔白旗』·····	〇七三
九、『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	〇八三
十、哪有时间从事写作·····	〇九〇
前夜	

——巴金在1977、1978····· 一〇二

一、《一封来信》结束了沉默·····	一〇三
二、不知从何处写起·····	一一〇
三、恢复了二年前的忙乱生活·····	一一四
四、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一一九

五、生命的开花·····	一二一
六、不能忘却的记忆·····	一二四
《随想录》的另一个文本	
——关于《随想录》手稿本·····	一三八
读《灭亡》札记·····	一六九
读巴金日记札记·····	一八四
读巴金书信札记·····	一九三
解读巴金思想世界的另一个视角	
——从巴金的译文看他的思想发展	
·····	二〇一
后记·····	二二三

朝鲜的梦

——巴金在1952

我想还是去朝鲜好，可以锻炼一下，对我改造也有帮助。丁玲他们也赞成我去朝鲜。所以决定去了。

——1952年2月18日入朝前于北京致萧珊信，见《家书》第22页

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可纪念、可宝贵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怀念那个时期的生活！我怎么能不反复地重温朝鲜的梦！

——1960年7月在上海，见《朝鲜的梦》，《巴金全集》第11卷414页

两次入朝对我的后半生有大的影响。

——1991年7月5日《致树基（代跋）》，见《巴

金全集》第20卷707页

一、我真的不愿意离开“家”

《老北京》这一类的书现在很多，大量的黑白照片和怀旧文字不难勾勒出北京城的旧貌，可是过了半个多世纪，对一个人心境的描述却不是这么容易，特别是对于巴金这一代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让他们学会了沉默，甚至习惯于讲套话。在历史风云中，哪一个是他们真实的身影呢？这样的问题常常困扰着我。比如说在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巴金还能找回三十年代在三座门大街与靳以等朋友一起编织的美好梦想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他们那时是不是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呢？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关于北京的记忆就是灰色的，特别是经历过“文革”之后，两鬓斑白，旧朋散尽，巴金更应珍惜“文革”前这一段难得的平静时光了。在《怀念老舍同志》中，他写道：“老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他，谈了一会，他照例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他们夫妇便带我到东安市场里一家他们熟悉的饭馆，边吃边谈，愉快地过一两个钟头。”北京，毕竟还有他一批老友，每一次他们的

聚会还会感受到旧梦的影子，曹禺、萧乾、沈从文、顾均正、汝龙、老舍等等，大家的生活毕竟比战争时的颠沛流离从容多了，再也不用惊慌地去躲警报了。到北京开会，巴金可以沉浸在友情的欢乐中，如果不必让那些烦琐的事务缠心，谁说不是一种轻松的解脱呢？

可是1952年2月的北京之行，巴金的心中装着的不仅仅是与老友重聚的喜悦，还有一层层的隐忧。多年以后，巴金是这样轻描淡写描述的：“一九五二年一二月我在上海接到家宝的信，他说丁玲要他动员我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我征求过萧珊的意见，她同意我去朝鲜，我便给家宝回了信，过了春节我就去北京报到。这个组由丁玲领导并主持学习，她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长。参加学习的人有二十几个，多数是赴朝的。我们出席了一些座谈会，听了一些报告，作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还打了反应强烈的防疫针。”^①写这段话时，困扰在巴金心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文革”，他不住追问自己怎么会一下子由人变成了牛，为什么会喝了迷魂汤似的丧失理智做出了那么多蠢事。一切都不是孤立的，在巴金笔尖下轻轻划过的赴朝访问跟他以后的

人生道路不会毫无关系。

在上面这段话中，有两个问题至今还是模糊的，一个是丁玲为什么要托曹禺动员巴金去朝鲜？另外一个巴金又为什么同意了？“征求过萧珊的意见，她同意我去朝鲜，我便给家宝回了信”，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回答后一个问题似乎更容易些，首先在巴金与萧珊的书信集《家书》中，我们看到有的不是为国征战的光荣和豪迈的心情，而是充满了依依不舍、担心的文字，或者说这背后还有许多的不情愿和无奈：

珍，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每次分别心里总充满着怀念。无论到什么地方总会记着你。（1952年2月12日致萧珊）

珍，的确，我多么想见，想跟你单独在一起谈四五个钟头。我知道没有人像你那样地关心我，也没有人像我这样地关心你……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1952年2月18日致萧珊）

有几句话每次都忘了对你说。我劝你把脾气改一下，不要对人板面孔，也不要对人发脾气

气。你想想,我现在做的都是我不习惯而且不会做的事,那么你也会把这点小脾气改了。

信写到这里,收到你廿五日的来信,我流了眼泪。我还记得“七重天”的故事。现在我真到战地去了。我会念着你,想着你们。(1952年2月28日致萧珊)

我有决心。而且想到你,想到孩子,想到大家,这会给我增加勇气,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在任何环境下我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1952年3月6日致萧珊)②

与此同时萧珊也频频给巴金写信,报告家中的情况,书写儿女对父亲的想念和自己对丈夫的依恋。萧珊的信文字上总比巴金多,说的事情也很杂,中心意思却很简单:对亲人的思念和对亲人安全的担心。巴金在对家的牵挂这一层之外,总让人感到有一种更复杂的思想存在。特别是把巴金这次入朝的家信与一年后再次入朝的家信,或者以后的出国、开会的家书对比起来,会明显地感觉到,这一次巴金表现得那么无助,像一个离家的孩子,他完全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在等着他。

“我现在做的都是我不习惯而且不会做的事”，这句话仿佛是一声叹息，给后来读到它的人很多联想。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改变的问题：原来是知识分子的松散、自由、个人化的生活，现在是军队统一的、有纪律的、集体的生活；原来是书斋中的安静，现在是部队中的凌乱和喧闹，接触的人也完全不同。但是如果仅仅是作息时间改了一下，以前九点起床，现在改为七点，事情就简单多了。现在要修改的是头脑中的思想，是与一个人的出身、经历、学养和性格息息相关的东西。以当时的气氛，我觉得巴金不会不明白，点名让他去部队，让一个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前线去，是带着改造他的世界观的成分在里面的。正如建国之初大批知识分子被派往各地农村参加土改一样。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根据全会精神，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然后在全国开展。同年12月5日，《人民日

报》以《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为题发表了胡乔木11月24日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报告,报告指出:要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造文艺家的思想,“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包括曹禺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写文章跟自己的过去告别,有人统计,从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不足一年间,就有30多位作家在《文艺报》上发表自我批评和检讨的文章。“与过去告别”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大势所趋。巴金不是在书斋中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的学究,相反,许多重大活动的主席台上还有着他的位置,他应该知道丁玲找曹禺“动员”他去朝鲜背后意味着什么。

二、把应该去的去掉

尽管人生的路只能有一条,但在回眸来程的时候,人们还是愿意做出许多假设,比如,假设巴金执意走自己的路会怎样?从当时的文艺界情况看,大约有这么几条不同的路。一种是不为新政权所容,要么被斥为“反动”而遭受严厉打击,要么被看做“落后”而中断了写作和学术生命,在枯萎中走向灭亡。沈从文即属此类,他自己都明白手中的这支笔

是不能再写下去了，只好改行。另一种正相反，为政权看好，委以重任，比如曹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得积极一些，他们是政策的呼应者和忠实的执行者，是很风光的大忙人。巴金在给妻子的信中是这样描述曹禺的：“家宝什么时候下工厂，还说不定。他和我不同，他的领导多，这方面要他这样，那方面要他那样，另一方面又催他写‘三反’戏。他也许会到苏联去。”^③而巴金好像正处在这两种人中间，属于又打又拉的“统战对象”，新政权并不完全信任他。据说巴金和胡风是上海最晚接到首届文代会邀请通知的人，在这次会上，他仅仅当选全国委员，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他同样是一个委员，在上海文联中，他也只是副主席，再就是友协理事等职位，全都是一些开开会的虚衔。一段时间内，巴金过着仍是看稿、写作的生活。他的旧作并不是像沈从文那样被通知毁版，相反却在他与兄弟办的出版社中大量再版。与那些争着表态批判自己的人相比，他只是不痛不痒地做了有限的一点自我批评，比如像“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薄弱”，“我的作品的缺点是很多的”，“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新的时代面

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地软弱，失色！”^④这样的话。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金基本上是谨慎地沉默着。到1951年，除了译作之外，他仅仅出版了《慰问信及其他》、《华沙城的节日》两本薄薄的集子，这十几篇文章大多是出访印象和一般性的表态文字。别有意味的是他在新的政权中第一次公开发出声音时，甚至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局外者。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他说“我是来学习的”，据研究者考证，这句话出自与巴金有着精神联系的俄国安那其主义者柏克曼之口，1920年柏克曼从美国踏上俄国的土地后，见到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农村凋敝，对俄国革命非常失望，他用这句话来表示对故国幻想之破灭，他对欢迎的群众说：“我们不是来教训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帮助的。”^⑤

但躲在小院中，守着自己的妻儿做着橘黄色的梦越来越不现实了。且不说思想改造运动巨大的气浪对知识界的冲击，像巴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安身立命的条件也越来越少了。在建国前，巴金是靠自己稿费来养家的，以从事出版和写作来履行自己的知识分子使命，可是1949年以后，大一统的体制，使知识分子的自由活动空间逐步被纳入到权力体系